

中西教育理念中的“自由”与“自律”比较研究

崔小沫

安养大学，韩国 14056

DOI:10.61369/ETI.2025050023

摘要：本文以中西教育核心维度“自由”与“自律”为对象，通过历史比较与跨学科分析，揭示其概念谱系、哲学基础及实践差异。西方“自由”教育以个体理性为内核形成权利保障机制，中国“自律”教育以伦理共同体为坐标构建责任伦理体系，二者本质差异体现为“个体主体性发展”与“社会规范性建构”的教育哲学分野。同时指出现代教育面临自由过度与自律僵化困境，提出通过平衡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张力，构建自主性与规范性兼具的现代教育范式，为教育差异认知与全球化改革提供文化解释与整合路径。

关键词：教育理念；自由；自律；中西比较；教育哲学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reedom" and "Self-disciplin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Educational Philosophies

Cui Xiaomo

Anyang University, South Korea 14056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re dimensions of "freedom" and "self-disciplin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education, revealing their conceptual spectrum,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differences through historical comparisons and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es. Western "freedom" education forms a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 with individual rationality as its core, while Chinese "self-discipline" education constructs a responsibility ethics system with the ethical community as its coordinate.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is reflected in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divide between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normative con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points out that modern education faces the dilemma of excessive freedom and rigid self-discipline, and propos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educational paradigm that combines autonomy and normative nature by balancing the tension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values, providing cultural explanations and integration paths for cognitive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 and global reform.

Keyword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freedom; self-discipline; Chinese and Western compariso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教育理念的深层分歧，本质是对“人的本质”及其发展路径的不同回答。在全球化教育治理转型与文明互鉴的时代语境下，重新审视中西教育核心范畴“自由”与“自律”的理论谱系与实践逻辑，不仅关乎教育改革的文化适配性，更涉及现代教育范式的重构。西方教育以“自由”为核心理念，通过理性训练实现个体潜能发展；中国教育则以“自律”为实践基石，通过道德内化达成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两种范式的分野源于文明演进的适应性策略，而在人工智能与知识经济时代，构建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成为培养“完整的人”的必然路径。

一、中西语境下自由与自律的核心内涵界定

（一）西方教育中“自由”的三重维度及其演进

西方教育的“自由”理念经历了从古典理性自由到现代多元自由的发展历程，形成认知自由、表达自由与发展自由的三维结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的“自由人教育”（Liberal Education），将自由界定为理性对欲望的节制，通过“七艺”训

练发展逻辑思维能力，使个体摆脱自然本能的奴役^[7]。这种“消极自由”观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中延续，被阐释为“遵循理性法则的意志自主”。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时期，人文主义思潮颠覆了宗教神权对人性的禁锢。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自然教育”理论，主张“消极教育”以避免成人干预，让儿童在自由探索中发展天性^[8]。康德进一步将自由定义为“自我立法”，认为真正的自由是理性个体对道德法则的自觉遵循，为现代“主体

性教育”奠定哲学基础^[8]。20世纪以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将自由与民主实践结合，提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强调在“做中学”中培养主动探究能力^[9]。当代西方教育通过制度设计保障自由，如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自由选课制”、芬兰“现象式教学”、英国“批判性思维课程”，均体现通过制度赋权实现个体自主发展的理念。

（二）中国教育中“自律”的伦理建构及其层次

中国教育的“自律”传统以儒家伦理为基底，形成道德自律、学习自律与社会自律的层级结构。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将自律定义为通过克制个体欲望以符合社会规范，最终达成道德理想^[4]。孟子“反求诸己”的内省功夫与荀子“化性起伪”的积习说，共同构建了“德性自律”的理论框架，使自律成为心性修养的过程。汉唐至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使“苦读”成为自律的外显形式，“头悬梁锥刺股”等典故塑造了学习伦理。朱熹“格物致知”与“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将学习自律上升为对宇宙道德法则的遵循；王阳明“知行合一”则强调自律的内在自觉性，使外在规范转化为主体意志。从《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关系可见，中国教育的自律始终与社会责任绑定^[4]。现代教育中，中小学班级量化管理、德育课程中的集体主义教育、高校“服务社会”的培养目标，均表明自律的终极指向是个体对社会共同体的责任担当^[1]。

二、理性主义传统与伦理本位文化的分野

（一）西方自由教育的哲学基础

从柏拉图“灵魂三分说”到康德“实践理性批判”，西方哲学始终将“理性”视为自由的前提^[10]。这种认知传统在教育中表现为对逻辑思维、科学方法的推崇；夸美纽斯“泛智教育”对知识系统性的追求，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对认知规律的遵循，均是理性主义的具体化。文艺复兴后的个人主义思潮将“个体”视为价值终极载体。洛克“白板说”强调个体经验重要性，存在主义哲学（如萨特“存在先于本质”）强化个体主体性，使西方教育形成“以学生为中心”模式，注重保护个体差异，鼓励独特性表达。

（二）中国自律教育的哲学基础

儒家思想以“人伦”为核心，《礼记·学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揭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建构社会伦理秩序^[4]。“修身”被赋予本体论意义，《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将个体道德修养视为社会治理根基，使教育成为“成人”的系统工程^[4]。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将个体与社会视为有机整体。《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强调个体需符合社会规范，避免破坏整体秩序^[4]。这种思维使中国教育形成“社会本位”传统，个体发展需在集体框架内实现。

三、教育目标与运行机制的系统性差异

（一）教育目标：个体潜能发展 vs 社会角色塑造

中西教育目标定位呈现个体潜能发展与社会角色塑造的根本分野。西方以“自由个体”培养为核心，美国教育协会将目标界

定为培育兼具批判思维、创新能力与社会责任感个体，其逻辑前提是个体自主——唯有独立人格才能理性参与民主社会^[11]。实践中通过斯坦福“设计思维”课程（无标准答案探究）、英国定制化“天才教育计划”激发个性潜能，评价体系纳入课外活动等多元指标，形成制度性保障。中国植根伦理本位传统，以德性公民塑造为目标，《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强调“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延续“德才兼备”逻辑^[1]。中小学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程、高校通过思政课强化集体认同，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需求；实践中体现为“双基”教学的扎实基础训练与《中小学生守则》的严格规范要求，通过标准化培养实现社会角色塑造，追求个体在伦理共同体中的“修身济世”统一。

（二）师生关系：平等对话共同体 vs 权威导向型关系

西方教育的师生关系注重平等对话共同体，如苏格拉底“产婆术”演变为现代“建构主义”教学模式，教师作为“学习促进者”引导学生探究。英国中小学“探究式学习”、美国大学“研讨班”制度均体现基于理性的平等对话，哲学基础是对个体理性的信任^[10]。中国教育的师生关系则强调权威导向型关系，如《荀子·礼论》将教师与天地、君亲并列为“治本”，奠定“师道尊严”传统。OECD数据显示，中国中小学教师讲授时间占课堂78%，显著高于OECD国家平均52%的水平，学生自律表现为对教师权威的服从^[12]。

（三）课程与评价：多元选择机制 vs 标准统一体系

西方课程与评价注重多元选择机制，如美国高中平均开设300+选修课，大学“核心课程”仅规定底线，评价注重过程性与表现性^[11]。芬兰取消中小学标准化考试，通过教师观察评估学生，体现对“发展自由”的尊重。中国课程与评价则强调标准统一体系，如中小学课程遵循国家计划，教材、进度、考纲全国统一，高考“一考定终身”强化标准化导向^[1]。语文阅读“标准答案”、数学“规范步骤”均体现对“规范性”的重视，2014年新高考改革虽增加选考科目，但标准化核心逻辑未根本改变^[2]。

（四）边界设定：权利导向的规则约束 vs 责任导向的自觉担当

西方教育注重权利导向的规则约束，如校园“反欺凌政策”、“学术诚信制度”通过外在规则保障个体自由，体现伯林“消极自由”观，认为规则是自由的保护壳^[9]。中国教育则强调责任担当，如从小学“值日生制度”到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均依赖学生对家庭、社会责任的内在认同^[1]。梁启超“自律之力，为人人生存之根本”的论断，概括了这种责任导向的自律本质^[2]。

四、自由过度与自律僵化的实践悖论

（一）西方教育的自由困境：自主性异化与社会性缺失

西方教育过度强调选择自由导致学生偏好简单有趣的课程，美国大学人文学科 enrollment 近十年下降23%（AAUP,2021），折射出知识体系的碎片化。社交媒体时代，学生沉迷短视频、游戏化学习，注意力持续时间从2000年的12秒降至2022年的4.2秒（Microsoft,2022），深度学习能力严重退化。西方教育的个人主义极端化导致“原子化社会”，美国校园枪击案频发、欧洲民粹主义教育思潮抬头，均反映出过度自由引发的社会整合危机^[10]。教育界不得不反思：当个体自由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如何培养

“负责任的自由”？2015年《共同核心州立标准》强化数学、阅读等基础能力要求^[1]，2020年英国重启“Phonics Test”提升识字率，均是对“放任”的纠偏。

（二）中国教育的自律困境：主体性压抑与创造性缺失

中国教育的应试教育中，学生为追求高分被迫放弃兴趣爱好，中国青少年抑郁率达24.6%（中科院，2022），折射出过度自律对心理的负面影响。“衡水模式”将时间管理精确到分钟，虽培养了纪律性，却导致学生“只会考试，不会思考”——PISA2018数据显示，中国学生数学能力全球第一，但“创造性问题解决”仅排第26位^[12]。中国教育中当自律异化为对考试规则的机械服从，其伦理内涵被抽空。部分学生表现出“策略性自律”——在教师监督下严格遵守纪律，独处时缺乏自我管理能力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现象，则暴露了责任伦理在功利主义冲击下的异化^[2]。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个性化教育”目标，2022年新课标增加“探究性学习”“项目化学习”要求，均试图在保持自律传统的同时释放自由精神^[1]。

五、构建自由与自律的辩证统一范式

（一）理论重构：超越二元对立的辩证关系

从教育哲学视角，自由与自律本质是“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西方教育需强化“积极自律”，可以借鉴康德“自我立法”思想^[8]，将自律从外在规则约束转化为内在理性自觉。如芬兰“现象式教学”在自由探索中嵌入“项目计划书”“进度汇报”等自我管理环节，使选择自由与责任承担同步发展。中国教育需培育“理性自由”。可以继承儒家“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智慧^[4]，在伦理框架内拓展自主空间，如上海部分中小学试点“基础作业+自主探究作业”模式，学生完成规定任务后可自主选择跨学科研究课题，实现“自律为基，自由为用”^[1]。

（二）实践创新：制度设计中的平衡机制建构

课程设置方面，西方可借鉴中国“双基”教学经验^[2]，在自由选课制中设置“核心能力必修模块”（如数学建模、书面表达），避免知识碎片化；中国可引入“选择性必修课程”，如高中阶段设置30%弹性课时供学生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平衡规范性与自主性^[1]。评价体系方面，美国近年兴起的“社会情感学习”（SEL）

评估，将自律（Self-Management）纳入核心素养^[11]；中国“核心素养”评价中的“批判质疑”“勇于探究”指标，则是对自由精神的制度化吸纳^[1]。师生关系重构方面，西方课堂可引入“结构性对话”，如设定“质疑规则”（先肯定合理部分再提出不同意见），在保障表达自由的同时培养尊重他人的自律意识；中国课堂可试点“教师引导下的学生主讲制”，如大学课程安排1/3课时由学生分组授课，教师从“权威”转为“对话组织者”^[2]。同时人工智能学习系统（如Knewton）通过算法推送个性化学习内容（保障认知自由），同时生成“自律报告”（如专注时长、任务完成度）帮助学生优化时间管理（培育学习自律）。虚拟学习社区中，区块链技术可用于记录学生的“数字自律”行为（如按时提交作业、文明参与讨论），形成可视化的信用体系，将责任担当转化为可量化的发展资本。

（三）文化自觉：在文明互鉴中实现创造性转化

西方教育中可以吸纳中国自律传统的伦理，如新加坡将儒家“忠孝礼义”融入公民教育，通过“共同价值观”课程培养社会凝聚力，避免多元文化下的认同危机；德国“二元制”职业教育将企业严格的技能训练（自律）与职业院校的兴趣培养（自由）结合，实现纪律性与创造性的统一，本质是对东方自律智慧的现代转化。中国教育可以借助西方的自由理念激活主体性，如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西南联大“自由治学”的传统，证明中国文化具备吸纳自由精神的内在张力^[2]。当代“双一流”建设中，高校放宽学术评价标准，允许科研人员自主选择研究方向^[1]；中小学“创客教育”鼓励学生打破常规，正是将“自律”从行为约束升华为“创新自律”——在遵守科学伦理的前提下自由探索^[1]。

综上，西方以责任伦理构建规则约束体系^{[9][10]}，中国以理性内化为基构建自律秩序架构^[4]。这种分野源于文明演进策略差异——西方借制度规则建构自由秩序，中国通过自律内化实现秩序中的自由。在全球化与人工智能时代，教育需培养兼具自主性与责任感的“完整的人”，可从理论上构建动态分析模型、制度上设计弹性政策、技术上开发智能系统三方面推进。未来研究可依托PISA、TIMSS等跨国数据验证假设，或通过教育实验探索学科融合路径^{[2][3]}，为现代教育理念提供实证支撑，在文明互鉴中推动教育范式的创造性转化。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Z].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 [2] 顾明远. 比较教育导论[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89-123.
- [3] 石中英. 西方教育哲学: 历史与现在[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45-76.
- [4]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132-135.
- [5] 李平沅. 爱弥儿[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78-92.
- [6] 王承绪. 民主主义与教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 101-120.
- [7] Aristotle. The Politics[M]. Translated by E.B. Bark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127-135.
- [8] Kant, I.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M]. Translated by M. Greg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44-56.
- [9] Berlin, I. Four Essays on Libert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21-139.
- [10] Bellah, R. N., et al.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56-78.
- [11]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 2015[R].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5: 34-45.
- [12] OECD.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0[R].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20: 112-125.